

DENGXIAOPING DE ZHEJIANGQING

刘金田 武市红 著

邓小平 的浙江情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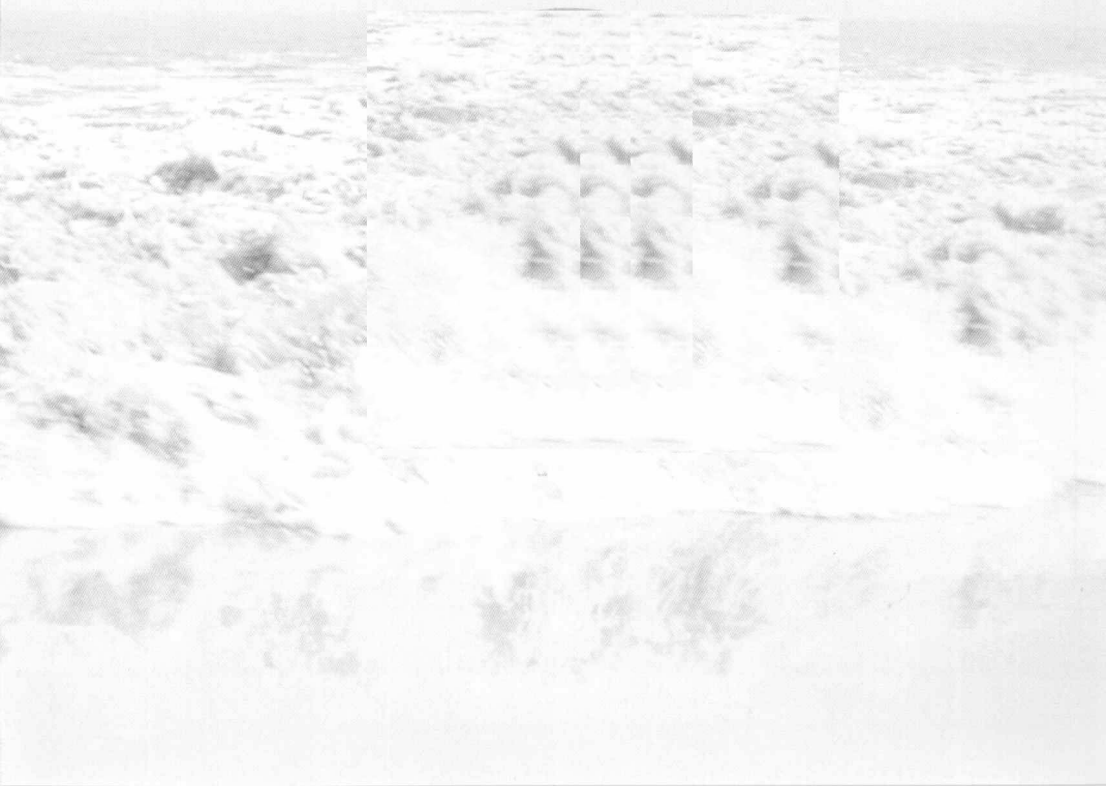


陈子平

的浙江情

邓小平

的浙江情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邓小平的浙江情/刘金田,武市红著.—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04.8

ISBN 7-213-02885-5

I. 邓… II. ①刘…②武… III. 邓小平 (1904~1997)—生平事迹 IV. A7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8584 号

邓小平的浙江情

刘金田 武市红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
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市场部电话: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(杭州市桐庐瑶琳镇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5

字 数 10 万

插 页 4

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13-02885-5

定 价 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提出小康目标 / 1

南下苏杭 / 5

关注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 / 23

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/ 33

“把全世界的‘宁波帮’都动员起来” / 41

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/ 65

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 / 71

未竟的心愿 / 79

“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” / 85

“你们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才是” / 103

爱民、亲民、不扰民 / 111

“浙江要保持好的发展势头” / 135

后 记 / 155

1

提出小康目标

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。到20世纪70年代末，为了寻找现代化道路，新中国领导人已执著地探索了30年，并为此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。但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些奋斗目标并没有像人们设想的那样如期实现。我们应当怎样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去设计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？

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，频频走出国门，先后访问了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朝鲜、日本、美国等国家。1978年9月12日，他在同金日成谈话时说：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，越看

越感到我们落后。什么叫现代化？50年代一个样，60年代一个样，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。10月10日，他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说：我们的四个现代化，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，要达到你们22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。10月24日，在参观了日本日产汽车公司后，邓小平感慨地说：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。

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，12月13日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，邓小平提出，实事求是，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，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。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胜利，是靠实事求是，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，同样要实事求是。循此思路，邓小平对中国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发展目标作出了新的定位。1979年10月4日，他在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：所谓政治，就是四个现代化。我们开了大口，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。后来改了个口，叫中国式的现代化，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。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，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。

1979年12月6日，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。会谈中，当大平正芳提出“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”时，邓小平沉思片刻后回答：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，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。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概念，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，而是“小康之家”。到本世纪末，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，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。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，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，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。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，同西方来比，也还是落后的。所以，我只能说，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。



1979年12月6日，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。在回答大平正芳提出“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”时，邓小平回答说：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，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。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概念，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，而是“小康之家”。

从此，中国现代化建设在20世纪的发展目标定位于“小康”。

提出小康目标，既是对20世纪中国发展目标的具体化和量化，也是对此前“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”设想的调整或修正。这种调整或修正，是邓小平对中国国情，特别是对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认识深化的结果。

南下苏杭

1982年9月，中共十二大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的纲领，确定了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。十二大精神，如春风化雨，滋润着人们的心田。在这以后，“翻两番”，能否翻？“奔小康”，如何奔？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议论的中心话题。这个目标切不切合实际，到底能不能达到，会不会又成为一个空的口号，人们都在议论，党的高层领导人也在思考。

1983年的2月，邓小平就是带着这个思考，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2月6日，他先到了苏州，三天后，他又来到了杭州。

铁瑛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）

一辆黑色红旗车缓缓停下，小平同志从车上下来，步履平稳，满面笑容，伸出手来与我和李丰平、王芳、薛驹等一一握手。

我想小平同志已经是年近80岁的老人，旅途劳顿，还是请他先休息几天，小平同志摇摇手说：我不累，大家进屋里一块谈谈。

这是邓小平第11次到杭州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，邓小平曾多次到杭州，参加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会议，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。

1959年4月，邓小平出席上海会议后，来到杭州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。这是他第一次到杭州。

在上海会议上，邓小平就修改1958年12月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的计划指标作出说明。

他说：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，看来我们原来规定的某些生产指标大了一点，基建项目多了一点。现在看得很明白，如果不根据客观的可能来制定计划，就难免在执行的过程中作一些不适当的安排，造成一些人为的困难，其结果不是搞得更多，很可能搞得更少。必须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，但它是受客观可能限制的。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，制定一个人们难于实现的计划，那我们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。

1961年4月24日下午，邓小平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阿·凯莱齐到杭州参观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收到了毛泽东的来信。毛泽东请邓小平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，并请邓小平当晚到他的住处，商谈此事。

这天晚上，邓小平和毛泽东在杭州刘庄，就起草中央工作会议通知一事进行商谈，一直谈到次日凌晨2时。

26日上午，邓小平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。会上，邓小平首先发言。他说：中央定于5月中旬召开会议，继续广州会议未定的工作，收集对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（草案）》的意见。现在应通知将要到会的各同志，利用专门时间，对农村工作的若干关键性问题，如食堂、粮食、供给、三级管理、柴山、三包一奖、耕畜归大队还是小队、恢复手工业、供销社等问题，进行重点调查，切实了解情况，向群众寻求真理，一个一个得出答案，以便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彻底解决。

5月2日至6月12日，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，根据中央和各大区、各部门的调查，对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（草案）》进行修改，通过了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（修正草案）》。修正后的草案较原草案在克服平均主义的错误方面有了很大进步，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。

这次会议后，全国经济形势继续好转，浙江的农村形势也出现转机。

伍一（曾任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）

我回想了一下，小平来杭州，大概五次。主要是开会的多，休息的少，我回顾了一下，休息只有一次，其他几次都是来开会的。因为那个时候主席健在，主席在这边，小平同志来得就多一些，对我们的工作也非常关心，跟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相处得也很好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南屏开。开始见到他，



1963年5月19日，邓小平到首都机场欢迎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。随后，陪同威尔科克斯赴杭州，出席毛泽东主席为威尔科克斯举行的宴会，同刘少奇、周恩来出席中国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联合声明签字仪式，并在声明上签字。

他就问：主席在这儿住得怎么样？生活你们安排得好不好？主席休息得还满意吗？他还说：我听说，你们很辛苦。小平同志每一次来，都要问，主席在这里休息得好不好。还会说，你们的任务很重，保密工作要做好。他老人家年纪大，走路不是很方便，你们可要考虑到。

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。他说话嗓门很大的，跟我们工作人员接触，也是有说有笑的，也爱讲笑话，很幽默，很平易近人。他也批评过我们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南屏那次会议。当时，王

芳同志交代我，会议用沙发。沙发都是大沙发，没有很小的沙发，都是一样的。他一坐在沙发上说，这个沙发太大了，大得背都靠不牢，靠牢背，腿就落不了地。他说，你们光注意到主席还不行啊，还要考虑到我们呀！那次会议耀邦同志也参加了。我就向王芳同志汇报，我说，我们的沙发太大了，坐上去不舒服。第二天，我们就把沙发换成了藤椅，藤椅前面有桌子，放放水。他当时就高兴地说，这就对了。跟着第二次开会时，沙发就变了，有大有小了。他也没注意，因为沙发的样子形状都一样，无非尺寸大小不一样了。我就跟他说了，您认为坐哪个舒服您就坐哪一个吧！他就坐在那儿，觉得舒服，也很好。他很高兴，哈哈笑了，说，你们动作真快。

上了年纪的浙江人或许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那段日子。因为浙江派性严重，农田荒芜，工厂停工停产，本是鱼米之乡的浙江，却要吃北方省市支援的地瓜干、玉米面。

铁瑛

浙江派性严重，停工停产。如此富饶的江南水乡，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，全国饥荒，而省内吃饭都不要粮票的浙江，竟需要从北方调运地瓜干、小麦来省内救灾！记得当时在运粮的火车车厢上，写着“送给浙江懒汉吃”的大字标语。多刺激人啊！像一方通红的烙铁，烧烫我的心！

为了解决浙江省委领导机关和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，1975年6月至8月间，邓小平多次听取省委有关同志的汇报，并派出专人

到浙江进行调查研究，协助省委统一思想，铲除派性，实施整顿。

7月13日，浙江省委向中央报送了《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报告》。两天后，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，对这一报告进行了讨论，通过了解决浙江问题的中央〔1975〕16号文件，即《中共中央对浙江省委〈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报告〉的批示》。

10月17日，针对王洪文等人对浙江省委的批评，邓小平还进一步明确指出：“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，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，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。如果不对省委支持，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，势必会有反复，这很不利。”

……

1979年9月，浙江人民出版社组织力量引进了一部分外国名著，经过反复论证和研究，决定出版美国作家马格丽特·米切尔著的《飘》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《飘》刚刚出版了上册，中、下册还在印刷过程中，就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关于出版《飘》的争论，有关领导机关和几家大报通过“内参”反映到高层领导，并引起了注意。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，邓小平肯定了《飘》的出版。1980年6月13日，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时说：你们有一本书叫《飘》，是写南北战争的。小说写得不错。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，因为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。我们想用中文出版这本书，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，大家看一看，评论一下。

邓小平讨厌“假大空”的文艺作品。早在1978年8月19日，他在同文化部部长黄镇、副部长刘复之谈话时就指出：文化领域



1983年2月，邓小平在杭州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铁瑛（右二）、王芳（左二）、李丰平（右一）、薛驹（左一）的汇报。



苏州虎丘万景山庄的镇园之宝“雀梅王”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，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。邓小平仔细地看了一番，一向不爱照相的他高兴地说：“来一张。”



1983年2月9日，邓小平游览苏州名胜。游览前他要求有关部门，园林要像往常一样开放，不要封园。在乘车视察市容时他说：要保护好这座古城，不要破坏古城风貌。否则，它的优势也就消失了。